

# 张光年的《向阳日记》

## ——干校与新时期文学之一

程光炜

**内容提要** 张光年的《向阳日记》记于1970年至1976年间，内容是他在文化部咸宁和静海五七干校六年的生活。笔者所用是前三年日记内容（1970—1973），后三年静海干校的生活，拟在另文叙述。日记搁置多年，直到1997年才被整理出版。因整理中有修改增删，又因需要时间沉淀，于是就有了今天如何处理“回忆”这一干校史料的问题。为避免日记的孤偏单薄，另增加一些干校下放干部的回忆文章，以及陈白尘《牛棚日记》和杨绛《干校六记》等资料做旁证，全文以“‘日记’自述”“画外音”和“小注”的形式标示。这种参照性的篇章结构，在反思中将回忆与今天连接，虽然回忆也将长久存在。

**关键词** 日记；干校；新时期文学

### 小 引

张光年的《向阳日记》1997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，讲的是他在文化部咸宁和静海五七干校六年的生活<sup>[1]</sup>。本文采集的是前三年的日记内容（1970—1973）<sup>[2]</sup>。后三年天津静海干校的生活，拟在另文中叙述。

1969年秋，文化部系统六千多名下放干部奔赴咸宁。张光年、陈白尘身陷王府井文联大楼，经他们多次申请，至年底也脱身到干校。

同一期间下放信阳五七干校的杨绛，在《干校六记》中生动描述了下放干部广场宣誓，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北京火车站登车（有的在永定门火车站），南下干校时的情景：“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”，“学部敲锣打鼓，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。下放人员整队而出；红旗开处，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。年逾七旬的老人了，还像学龄前儿童那样排着队伍，远赴干校上学”<sup>[3]</sup>。

詹姆斯·E. 扬说，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回忆则是人们看到的事情，“大部分史学家都以这种区分为出发点。”该文副标题是，“论将回忆之声

重新纳入历史叙述”<sup>[4]</sup>。这就牵涉到今天怎么处理“回忆”这一干校史料的问题。《向阳日记》从撰写到1997年整理出版，相隔二十余年。其间，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作家协会领导岗位，80年代中期退休，90年代又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所以整理只能是在修改日记基础上完成。日记引言说“选录的都是日记的原文”，不过“删节处多半加上省略号；新注的短语加上括号；必要时在页末加小注。”<sup>[5]</sup>这证明确实删节或增添了一些内容。

如此，出于研究需要，本文在日记的孤证之外，另增加一些咸宁向阳五七干校下放干部的回忆文章，包括老友陈白尘《牛棚日记》和杨绛《干校六记》等资料做旁证，以“‘日记’自述”“画外音”和“小注”的形式标示<sup>[6]</sup>。这种参照性的篇章结构，是要在反思中将回忆与今天连接。

旁证会对孤证起到修正、补充和校勘作用，有时候，也可能对孤证误读和过分阐释，所以干校作家的研究，仍然有很远的路要走。

### 一 劳动

文联大楼牛棚剩余人员，邵荃麟、刘白羽被转

移到卫戍区，冰心、张天翼、郭小川、张光年和陈白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下放咸宁干校，后两人由北京和干校双管<sup>[7]</sup>。干校有普通群众和分子两类人员，张陈属特殊人士，他们是否会享受重体力劳动待遇呢？83岁的张光年在“日记·引言”（以下均简称“日记”）中说得比较轻松：“不能忘记李季同志、严文井同志、许翰如同志<sup>[8]</sup>、葛洛同志、林元同志以及其他几位同志，他们身受委屈而被结合为连排干部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给我以照顾和方便。”<sup>[9]</sup>考虑到日记整理出版时，除李季故世，其他人仍健在，作者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等情况，这些话应大部属实。

“日记”自述：干校根据政策，对60岁以上年迈体弱的老作家冰心、张天翼、臧克家和冯雪峰等，一般分配诸如看菜地、夜间放哨和放鸭等相对轻松的劳动。张光年时年57岁，不在照顾范围，可“日记”对“轻松劳动”的记载依旧不少：“今天我被分配与谢冰心轮流看菜地，谢要回京，我便独自在菜地坐了一天。”（1970年2月11日，星期三，晴）天气晴朗，前天五连与红星九队、十队贫下中农春节联欢，原以为自己无权参加，临时又允许观看，所以在菜地的心情应许不错。再如用两头扎紧的裤子背粮，给陈默装了40斤，侯金镜、李季、孙一珍减到20斤（因臧克家还不到20斤），自己装积极非要背40斤，结果滑落水塘。他由此学乖，一路沿着河岸，独自把20斤麦粒背回驻地。（1970年3月4日）

作者也承认干校不是世外桃源，不会让人轻松地混日子，“劳动态度”批评会就是一例。1970年3月29日，星期日，雨。下雨不出工，改两餐，学习文件和领导讲话精神。“晚饭后继续讨论。汤×发言中揭发我前两天在麦地锄草时漏掉半行，经她指出后我拒不承认，态度嚣张。臧克家也是这样。我接着发言，说她讲的不合事实。我讲时态度恶劣，引起革命同志义愤。陈×、孙×、葛×等同志都先后对我提出尖锐批评，同时批了臧、冯（笔者注：冯牧）等人的劳动态度，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。会后葛×找我谈话，我承认了错误。”

画外音：就干校人员的叙述看，1969年秋到

1971年底是重体力劳动期，比如盖干校宿舍、围湖造田、挖泥挑泥、平地、抢种抢收等，且小雨小干，大雨大干<sup>[10]</sup>，把不少人累得人仰马翻。《文艺报》副主编、文学评论家侯金镜因此诱发心脏病亡故。这些当事人材料，是对上述“日记”空白的填充，也是在修正和延伸。

萧乾的回忆就是这方面的例子：“我是将满六十时下干校的，但不知怎地，派活时总是被当作壮劳力使用。要求我一个人挑两满桶粪，而比我年轻两岁的（笔者注：不知指何人），只消两个人抬半桶。雨天或假日派公差，也总短不了我。有一次洁若站在山墙下递灰浆，看我挑两大桶灰浆趑趄起走来，便央求排长，让她跟我换了工。但我们二人并不经常在一起干活，我逐渐感到体力不支了。”一次五连干群连续五十来个小时双抢，头天黎明前下湖，第三日中午才回宿舍。连队派他做把打谷机吐出的稻草堆成草垛的轻活，然夜间两班倒，一小时一换，哨子一吹，刚歪倒稻草上休息也得马上起来。“第三天上午，我和另外两个也已到六十的终于垮了下来。”大队长路过时睬也不睬，倒是一个五七战士妻子将他送回<sup>[11]</sup>。

小注：同为老干部的韦君宜的追述，是“日记”的另一个参照点，也与前者的轻松表述不同。牛汉看见，在1969年9月同趟赴干校的火车上，死老虎冯雪峰较平静。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韦君宜，虽是第一批派遣干部，神情却“木呆呆的”<sup>[12]</sup>。在韦君宜心目中，比繁重劳动更难忍受的，是身边人员的嘲笑和歧视。有一天，分配她和舒芜一个坑一个坑地挖厕所，“我们两人累得大汗淋漓”，刚想欣赏一番工程，又被派到另一个厕所工地。她记得，“平时，我挑不动砖时就用胸顶着上。有一次，盖房子抹墙，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，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，向三面供泥。”下面两个孩子知道我是黑帮。“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，那边又喊：‘来呀！来呀！韦君宜呀！’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，他们却大笑。”她还看到，社里的杨霁云，曾经和鲁迅是朋友，年迈干不动活，铲土只能铲小半铲，于是被首位连指导员取了个“二两半”的外号<sup>[13]</sup>。

另外，在“将回忆之声”如何“重新纳入历史

叙述”这一很棘手的问题上，对“画外音”的认识，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来辨别。举例之一，萧乾有京派和右派身份，张光年是双管人员。但张是老干部，在群众眼里与萧不能同日而语。举例之二，韦君宜、张光年同属走资派，却因人际关系等因素，境遇有所不同<sup>[14]</sup>。“日记”里未见侮辱性的记载，而韦文则愤愤不平。这是否是相关内容已被作者删掉，韦文从个人角度将它写出，也未可知。

“日记”自述：张光年不回避重劳动的记述。如前所述，他年龄不在照顾范围，因连排干部李季、严文井的暗中协调，也有了某种照顾的性质。不过，他仍吃过不少苦头。据1970年1月11日至2月16日“日记”记载，尽管痔疮严重脱肛，有一个月零五天，他每天都在石子场劳动。1月16日上下午，和侯金镜“共装石子约五十车”。晚上，又跟胡德培用胶轮车去接北京运来的家具，卸车并搬运至童家湾仓库。看仓库人员未归，便代为看守，夜十时方回宿舍，十二时眠。2月1日，晨六时起床，六时半早餐，七时出工。因为动作较慢，未赶上排队去工地的队伍，于是，又被安排到石场敲石子、筛沙。由于紧张繁忙，引起“颜面、眼皮、腿和左手浮肿”。张光年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（现老河口市）一个中等商人之家。虽然大学四年级最后一学期因欠学费辍学，但在城里长大的他，从未干过体力劳动。这番辛苦狼狈，令这位特殊的五七干部始料不及。

画外音：臧克家1905年生人，长张光年8岁，当时约66岁。他属干校照顾对象，在“日记”描述的艰苦环境中，即使做轻活，身体也难舒服。他的《咸宁干校散记》，却似乎有一种局外人视角，令人相当不解。他淡淡写道：“下放到农村，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，可能确实是一种惩罚；而对于我这个‘不爱刺眼的霓虹灯’，只爱‘乡村里柳梢上挂着的月明’的‘乡下人’来说，却可以说是‘鱼儿归大海，鸟儿入深林’。当时，我甚至打算后半辈子远离喧嚣的都市，归隐田园，做个‘现代陶渊明’。”不过文章显示，他也干过“盖房掘井，围湖造田”的苦活累活，颇觉“吃不消”。从1969年11月到1972年10月被“解放”

回京，这三年，心情不可能好过别人。他还是忍不住写道：“说来也好笑，过去我有一些多年求医问药都治不好的老毛病，到干校后竟不治自愈了。”如失眠、消化不良等。相较别人，他更喜欢粗茶淡饭<sup>[15]</sup>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与张光年身份相同的陈白尘，曾在《牛棚日记》里对干校劳动发过牢骚，但与张氏“日记”不同，他不隐讳自己和不少下放干部都有过的，对“向阳湖”劳动成果和建设成就的欣然心态：“平心而论，我们干校是有不少建设的。首先，围湖开垦，就筑了一条周围十余里的大坝，宛如一座土城，这是一铲一铲泥土堆筑起来的。而大坝四周就便挖了条宽约二丈的壕沟，仿佛护城河。其次，修道路，搭桥梁，大坝里四通八达了。再其次，半年以后，各个连队都建筑起一排排简易砖瓦平房，而且还装上电灯。最后，即使‘收的少’，但在大坝之内万顷亩良田里，到底也收了不少粮食；而菜园中的蔬菜，猪栏里肥猪和所饲的家禽，大致也接近自给了。”最后他告诫说，“至于这些成就花了多少钱，那是只算革命账，不该算经济账的。”<sup>[16]</sup>

小注：与干校人员艰苦劳动的记述相比，臧克家的文字显得扎眼。不过，也不能说他在掩盖历史真实。出身农村的干部，与出身城市缺乏农业劳动经验的干部，对农村生活和田野情境的感受确有不同。比如冯雪峰，他“出身农民家庭，又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吃过小米，扛过步枪，蹲过监狱，在各种磨难中淬过火，因此在这个组里，干得十分出色，连最好挑剔、以找碴儿为职责的某军代表，也在人后啧啧地称赞过这个瘦弱的老头”<sup>[17]</sup>。身份也会决定态度，张光年有麻烦在身<sup>[18]</sup>，臧克家属普通锻炼干部，他虽在干校三年，但心里明白终有“解放”的一天。臧氏欣然又戚然地写道：“1972年10月我‘解放’不久，连部领导严文井等同志呈报校部，批准我提前返回北京。离开连队时，很多同志依依相送，我一步一回头，泪洒满襟。”<sup>[19]</sup>张光年1972年10月1日“日记”记述，臧克家行前来宿舍小坐，对校部不批准他回京探望80岁老母表示同情。14日“日记”又补叙：“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，说（他的）历史问题是维持了



一九五六年结论，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。他说很受感动，哭了一场，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。”显然对臧并无恶感。

陈白尘《牛棚日记》与“日记”视角有异，也印证出张光年的历史叙述剪裁了干校劳动成果，暗藏对劳作惩戒的抱怨心态这样的事实。“日记”因装填了较多新时期意识，也许会挤压后代研究者阐释干校的空间；《牛棚日记》一定程度上与“新时期意识”保持距离，则可能在更远阔浩渺的视野中，秉持历史叙述的超然姿态。的确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干校构建，带有历史风暴对读书人的惩戒性质，那场悲剧本可避免。但如果没有那场悲剧，也不会催生众多当事人的觉醒，为新时期文学储备那么多优秀的先觉者、建设者。这种辩证性思维，对于解读“日记”尤为必要。正如有人所说：“引入的这类回忆提醒读者，历史是由一定的具体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回忆和叙述的，因而历史也是由具体的人创造的一个过程。”然而，同时也存在着“那种想要过快地得出认识和确切结论的危险。”<sup>[20]</sup>

## 二 冷与暖

干校生活在劳动和批评会之外，也有人性深处没有泯灭的温暖。

《向阳日记》整理于1997年，它在干校1974年关闭23年后才得以姗姗出版。“回忆终将以某种形式导致某种治疗效果”<sup>[21]</sup>，更何况那一切都已成时过境迁的历史。出于这种宽阔的胸襟，“日记”对批评会等内容有删节。除前面那场“劳动态度”批评会的详细记载，整部书采取的是模糊处理的叙述方式。相反，它不吝篇幅肯定了人间关怀这一更积极的力量。

“日记”自述：晚饭后，菜班班长朱行来转告黄寅副连长决定，“明确以休养为主，不必跟大家一起上班，散步时到菜地看看，帮助捋捆瓜秧，力所能及地做点轻活，累了自己掌握回来休息。哪几天身体不好就不去，也不必每天说明。菜班学习会可参加。注意养好身体，以后对工作有利……”等。（1973年6月2日）

画外音：干校初期的小将和部分群众，曾作为所谓分子甄别处理，他们的看法并不乐观。阎纲白天劳动，夜里送回仓库交代问题。“我被带进窗户用棉被蒙得严严实实的屋子，如山洞，如深涧，如地窖，如下水道，如地府。”结束后，“还是不准打盹，看守们‘猫’在仓库的一角越是开罐头喝酒，我的脸浮肿得越厉害。”<sup>[22]</sup>顾学颀说，这些女头头，以前级别不高，收入微薄，对高知一直怀着嫉妒心理，一旦有权，便愈加整人。那天星期天休息，我利用难得的时间到附近池子里洗衣服，还没洗完，她们“便命令我跟另外两个‘分子’，拉车到几十里外的县城里买东西（日用品、食品等），第二天也不补休。这是一项苦差事，是‘分子’们的专利。我那时已快六十岁了”……<sup>[23]</sup>

小注：张光年1973年这段“日记”记述的是，干校后期由严肃转为宽松的生活。阎纲和顾学颀回忆的，则是干校初期剑拔弩张的氛围。这里有一个历史发展的“时间差”。在我看来，后者补充的有可能是被前者删掉、修改过的“空白部分”，它补写了“日记”传主前期紧张、压抑的心态。而这些“日记”里被删节、压缩或涂改过的部分，却在日记“引言”中偷偷地复活。作者尽管极力控制情绪，但依然愤懑地指出：“初期那几年，……老干部、老教师、老文化人（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等等）……日日夜夜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身受者不堪回忆。年轻人略有所闻。我此刻不愿提起。但愿给少不更事的……‘革命群众’留点脸面，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吧。”

作家协会编为五连，人民出版社编为十三连，是相隔不远的连队。因执行政策不同，对病人的态度有一定差异。这两个单位，因人事矛盾，也会辐射到连、排长的处置方式，需做具体分析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比如，王子野被拖延送医，侯金镜却给予输氧，尽管还是耽误了最佳抢救时机。与周围人对王子野患病的冷淡态度相比，张光年“日记”对侯金镜之死有同情笔调。韦君宜《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》讲述的10位故世者，其中人文社有8位，中华书局和作协各1位，可知出版社的生存环境比作协还有艰厄。

“日记”自述：1973年8月15日，连部给张

光年开具回京治病的病假证。车马未动，粮草已先行。张小华、楼秋芳热心安排儿子张安东去长沙、韶山参观的旅途事项。下午，阎纲、李基凯、尹一之、赵秀文和计永佑帮助捆扎行李，“除铺盖、帐子、席子等明天由李基凯捆成两件外，其余捆成四件”，装书籍杂志的两个木箱纸箱及杂物，则被贴上托运标签。“连长许翰如来谈，嘱安心治疗，按时同连部联系，不要到处跑。”“支委叶勤来，建议将所有东西都带走。我说先存放这里，以后必要时交付托运。”同事送别情意深挚，由此反映作家协会在干校初期斗争气氛紧张外，同事关系还算正常；及至后期，大家的患难之交，已在具体事宜中体现。“日记”作者为之感动，但语气尽量做到了平缓：“晚上不断有同志们来话别，我也到老五连各个房间告别。丁力原来也要送我进城，说是明天有事，不能去了。”（据当天日记）

画外音：红学家周汝昌对提前返京事实的记述，同“日记”有一些差别。1970年8月下旬，他从菜地返回吃早饭，突然接到去队部的通知，难免一番紧张。来干校不到一年，处在运动边缘，他担心有什么事找到自己头上。到后才知是虚惊一场，队部干部张宗禹客气地出示公函，上面写道：“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至湖北军区司令部：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……”。原来，《红楼梦》的整理研究已被提上日程，需要从各地调回红学研究专家，周汝昌显然在上面挂过号，自然应召返回。一些同事表达了友善，刚从北大分来的年轻编辑彭庆生拉车送行。一位鲁迅专家的反应却大相径庭，周先生用一贯简洁的笔致记叙：“上路了，辞别了碰上的人们。到出‘村’口，见林辰先生小凳子坐路旁——那是派的守路口盘生人、防私逃的职务。我向他作辞。他坐着不动，冷冷地点头示意。（他与孙用系原《鲁迅全集》编辑室的人，后来调古典室任副主任，是我的上司。在先，他还视我为‘学者’，见到就笑而示意；后来‘文革’他对我有看法，曾大嗓门批判我，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‘反动的知识分子’。在干校又住同屋，极少理我，颇有‘敬鬼神而远之’之雅致了。）”<sup>[24]</sup>

周汝昌对林辰事迹的叙述，一度是干校生活画

外音的主体记忆。然而依我看，画外音还有不应忽视的多层性，譬如干校普通人员的回忆。后者在增补“画外音”的丰富性时，也补充了某些曾经受冷遇的内容。李昌荣是中国作家协会一名普通机关干部，曾作为先遣队员，提前到咸宁干校踩点和联系。初到干校，她决心走好“五七道路”，购买理发工具，义务为大家理发。因此，她这个局外人的“画外音”，比画外音的主体部分更客观，一定程度印证着张光年“日记”关于人间的良知依然在严峻年代存在的事实。她清楚记得，义务给五七战士理发，自然是好事，但给某某理发就有问题了。“他们那时多半很拘谨，不大好意思让我理发，头发往往长得很长，蓬头垢面”，令人于心不忍。而且一夜间，与她同龄的吴泰昌、周明、杨匡满“成批地变成”那些人了。“我呢，管不了那许多，谁头发长了，照理不误。”<sup>[25]</sup>

小注：“日记”对特殊年代“冷与暖”的自述，有一定的现实依据。据宗璞说，她一次去张光年崇文门外的家探望，张告诉她：刚倒霉时，众人都不理他，有一次在灯市口遇见，她曾过来握手。为此，张光年诗作《握手》动情地写道：“当黑色的风暴，/席卷中国大地；/我匆匆穿过长街，/一切熟人视同路人的时候，/感激你，真挚的朋友，/你默默地同我握手”<sup>[26]</sup>。如果说，李昌荣的旁证还局限在干校小范围，那么宗璞的旁证则将有关温暖的历史讨论，引向了一个更广大的社会空间。正是这些依据，奠定了“日记”历史回忆的思想基调。它虽有删减、增补和修订，其中的主线，仍然是符合20世纪70年代的真实生活逻辑的。我们要知道，这可是《黄河大合唱》歌词的作者，那雄浑的旋律、高远的境界、充沛的民族激情，不可能与“日记”完全撕裂。

张光年1972年至1973年几次请假回京治病前后，连队是否也有嫉妒和不友善的人？“日记”没有记载，不好妄加推测。不过，从绿原的追述看，李季对张光年和他的态度，明显有别。并非后来被不断回忆的好人，都在特殊时期不做坏事。1969年中秋节，妻子罗惠对他独自下放干校不放心，特别请假来向阳湖探亲。一次两人在附近散步，“走到一条河边，遇见对岸过来一群人，大都是干校

的““五七”战士”，中间有一位是诗人李季。解放初期在武汉，我们常碰面，但在干校，他从没跟我讲过话；此刻见到她和我一起走来，他却改变常态，笑着迎上去同她握手，并对她说：“你来了？来看看我们的向阳湖吧，这里比北京的空气好。”其实，干校不理睬绿原这个“胡风分子”的不止李季，也有本单位的女同志。在去城里购物路上，“一些平日不大跟我讲话的女同志，这时破例向我点头微笑”，有的还走近跟妻子攀谈。受此鼓舞，“我不禁忘形起来，粗着嗓子向她们介绍：‘这是我爱人罗惠！’似乎这时才觉得自己原来真正是一个人，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”<sup>[27]</sup>。

严肃的人际关系，因情景变化而发生微妙的戏剧性变化，是“将回忆之声重新纳入历史叙述”的另一个难题。“日记”基于篇幅的考虑未记，当情有可原。

### 三 吃穿用

特殊环境中的劳动和人际关系，是“日记”记叙的主要内容。然而，下放干校干部的吃穿用问题也不该忽略，因为它指向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“日记”自述：在1971年2月4日日记里，张光年晒过工资及支出情况：1. 每月工资243元。扣除汇家里生活费150元、干校伙食费13元等，剩余77元。2. 每月交党费20元。3. 然而情况会有变化。去年上半年每月汇家120至130元。因长子张安戈去山西插队，老母看病，因此增至140至160元。大妹张蓬病孩子住家，还需保姆费。4. 除去上述种种，自己尚剩60至80元。这笔款项应付干校生活支出后，如纸烟、药品、副食品、衣服、劳动服、雨衣、鞋袜、床单等，“则所余不多”。其原因，“这是用钱无计划所致”。（另注：去年发还工资390元，被北京专门部门扣存未给。）5. 妻子黄叶绿工资120元，每月给自己母亲寄30元，另补贴大哥，以及为孩子们添置衣物。“由她自己掌握，我从未过问。”在那个年代，这是高干工资水准，由此可知他在干校做活虽劳累，生活也还优裕。可公社时期农民每天工分，按照最强男劳力一天10分计算，市值人民币8分钱。湖北农业在全国属中

上等水平，提高一点应是每天1角。1天1角，10天1元，一个月总共3元（这还未将下雨未出工扣除。而大部分男女劳力，每天仅6到8工分，收入更少）。这样，一个农村壮劳动力一月的收入，仅为日记作者的零头。难怪咸宁农民要把下放干部看作是特殊人群。由此人们的“历史之同情”，大概也要减分。

“日记”对吃穿用的记叙极为详细。比如，上午10点吃饺子。饭后去五里外的甘棠镇购马灯、帐钩、搓板、香烟等。（1970年1月2日）“十五日中秋节，连部配售每人月饼六个，苹果一斤，梨一斤半。我买了一份。”（1970年9月14至16日）次年1月29日这天，过得相当惬意。晨六时同尹一之同行赴咸宁城，步行1小时55分钟到。先替王文迎寄信，代王宏伟发电报。9点乘公共汽车到温泉。先吃油条和米酒早点，然后预备痛快地泡泡温泉。遗憾的是，此时革委会澡堂正在放水，于是这澡盆里只放了小半盆热水。在“很冷的空气中脱衣，手冻僵不能解扣”，“草草擦洗了一下，还在澡盆里狠狠摔了一跤，总算是洗过澡了，居然没有冻病。”不过，再回咸宁又有补偿。买了酥糖、《赤脚医生手册》《常用中草药图谱》等。与尹在饭馆大吃一顿，“买的是红烧肉、炒肚片、卤牛肉”，除后者假牙咬不动外，其它甚好。是晚，本打算记日记，给阿蕙写信，汇报春节假期生活情况，但同屋陈一计约郭小川、张僖来下棋，噪音很大，致使“无法学习和做事。”（1971年1月28日）……如果将麻烦在身、繁重劳作的不快屏除，能暂时像阿Q那样麻木忘却，这番生活，倒真如臧克家所说，是一种近乎隐居山林的“田园生活”了。

画外音：“日记”作者只比大部分人晚去干校三个月，初期供应紧张的状况未明显改观，不知何因未记。在此引用“画外音”，聊作补记。

普通干部郝孚逸说，每月交伙食费12元，“因为开头自己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靠买”，所以“就只够常常啃老倭瓜了。”<sup>[28]</sup>杨子敏说，“建校初期，我们顿顿吃的主食都是略带霉味儿的糙米饭。副食则是清一色的老倭瓜。不知是哪一位的发明，把‘革命京剧样板戏——沙家浜’里郭建光的一句唱词：‘一日三餐有鱼虾’，‘篡改’为‘一日三餐有



倭瓜’”，“这个移花接木式的创造”“在连里广泛流传”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能休息日三五结伴去咸宁，抢购点心补充营养。<sup>[29]</sup>

由于食物缺乏，家里寄食品的现象日渐增多，于是连队的没收和批评接踵而至。陈白尘说：“晚，W叫去，对已拆开的大包裹里的一堆东西大肆批评，问我对什锦酱菜罐头（四瓶）、肉酱（二小瓶）、大头菜等怎么处理？我明白这意思，忙说：‘这是家里主动寄来的，我决不吃，听凭连队的任何处理。’W说，送给干校幼儿园如何？我说当然好。W将半高统雨靴、雨衣、挎包、水壶等物交我。这都是我去信索要的。食品中只有味精、辣椒粉漏网，已很满足了。”各班排都开了批斗会。“听冯牧说，我的‘罐头事件’各班、排都已议论过了，但因购罐头者极多，嘴都不硬。”<sup>[30]</sup>

小注：可见在干校，像“日记”作者这种高工资者只是少数人，大部分下放干部扣除给家里的汇款，多囊中羞涩。“小注”因此可作“画外音”的进一步延伸。

“日记”自述：与建校初期半地下的偷吃不同，因干校后期人员纷纷离散，吃穿用现象才完全公开。“日记”记述购物的文字越来越多，有时近乎抒情散文的语调。今天早起，约电影口的朋友共游西凉湖，“我怀着买灵芝的愿望，决定同他一起去玩玩。晨七时半出发，公路吹得半干，可以拾路而行。”“买到十余斤（每斤六角），质量较好，有些较大的。”在林诗仲处听说，三位蒲圻女孩的灵芝，被一连包下，急忙赶到黄文珍那里，始知昨日弄到的一麻袋中，“有我的一份”，但仍嘱她代自己多多“收购”。（1973年7月8日）七天后，又到蒲圻县境收购，“每人购得一二十斤”，大喜。回程再买长江牌香烟一条，汗背心一件。（1973年7月15日）托人去城里购到上海牌香烟一条。（1973年8月7日）继而托李昌荣代买二十个鸡蛋。（1973年8月9日）当月23日探亲，在京城购物热情不减：“从医院回来，坐错了站，在东单下车”，欲去菜场买老母鸡，但见排队很长。（1973年8月23日）这一期间，虽然女儿安迪推荐上北京外语学院事情，因受自己牵连失败，（1973年7月31日）“上书周总理”也无果，（1973

年8月1日）心情略微受伤之外，作者1973年中的购物生活还真风顺水。

画外音：然而，并非干校剩余“留守人员”都像他那样怡然自得，牛汉就牢骚满腹。他说，1973年之后，文化部干校只剩百把十来人，极为萧条。大部分人返京，少数设法调到各省市，虽然干校像大学推介毕业生一样，积极向一些单位介绍剩余人员，但还是有人无处认领。深秋时的郭小川，“还穿着邈邈的衬衣，瑟缩发抖，流着清鼻涕，挺可怜的样子。”劳动任务呈敷衍状态，但无处可归的人只能惺惺相惜，如张天翼老婆、舒芜和绿原等。牛汉80年代写过短诗《华南虎》：“在桂林/小小的动物园里/我见到一只老虎”……“笼里的老虎/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/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”，便是此情景中的愤懑之作<sup>[31]</sup>。牛汉、郭小川都是有血性之人，牛有《华南虎》，郭有《团泊洼的秋天》，记录于“干校”历史行将就木之际，有愤懑，亦含有对未来的期冀。此时大家都在四处探寻，各找门路。正在“漫天风雪，大地冰封”中放牧鸭群的陈白尘，有一天连负责人严文井忽然找他协商，说如果等待结论，不一定非在咸宁。如回南京，找谁安排，也不得而知。但“这是更明确的暗示了”，有温情留于其中，尽管未来一片茫然。（1972年2月4日至29日）<sup>[32]</sup>

## 余 声

以上众多回忆指向同一个地方，也在那里存在歧义。它们作为旁证，印证“日记”所记的点点滴滴，同时在修订、扩充、丰富后者留下的空白、疑点。不尽相同的出发点，会决定人们对历史的不同看法，对历史的不同记录。相反，研究者则借用这些不同点，重新搜寻和思索，找出其中的“结构性的东西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张光年《向阳日记》提供了弥可珍贵的讨论文本。其中，就有一个“结构性的东西”，也就是说，这些“回忆”都是以“新时期”为镜子。只有在这面镜子映照下，“回忆”才是积极的、有意义的，反之则让人难过。“日记”作者感同身受地指出：“要不是经过十年浩劫那样翻天覆地死去活来的震荡，

我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或许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。”他于是从中悟出，“事过境迁，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，看到我们中国人民伟大的生命力……也看到我国知识分子百折不挠的强大生命力，眼前涌现出无穷的信心和希望。”<sup>[33]</sup>

[1] 七十年代，文化部除湖北咸宁“五七干校”外，还设有均县分校。咸宁人数最多，有六千余人。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文联被划归咸宁干校，编为第五连。文化部另一所五七干校，在天津静海的团泊洼，1970年9月由宝坻迁来。它由八个协会和戏曲研究室、电影剧本创研室等二十余个文艺单位组成，下放干部六百余人，如华君武、吕骥、吴祖光、王朝闻等。1974年12月咸宁干校解散，郭小川、张光年被转到此校。

[2] 李晓祥：《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“五七”干校》，《湖北文史资料》1999年第2辑。1969年秋，干校军宣队来自北京军区张家口某驻军，1970年6月至1974年底干校解散，期间由湖北军区接管。本文作者为湖北军区派驻干校的政委。该文详细叙述了当时干校各级组织机构及其他情况，比如，核心领导小组由文化部徐光霄副部长担任组长，军代表任副组长；以下各连队、排、班长由下放干部担任，另配有一名军代表。另外，“向阳湖”原名为“斧干湖”，由于干校下放干部改为此名。张光年1969年底到1975年10月分别在咸宁、静海干校，所以他有六年“干校生涯”之说。

[3] 杨绛：《干校六记》，第8—9页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。俞平伯1900年生人，时年69岁。此处还有一个旁证值得补记：栾勋回忆，俞先生和夫人大表姐站在队伍前排事实属实。不过“军宣队的指导员老李看见俞平伯跟他的夫人排在前头，可能想，怎能让资产阶级权威走前面呢？于是，他让我走在前面。”见栾勋《人事与狗事》，《无罪流放：66位知识分子“五·七”干校告白》，贺黎、杨健采写，第14—15页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。这一新场面，杨绛可能没有看到。

[4][20] 詹姆斯·E. 扬：《在历史与回忆之间——论将回忆之声重新纳入历史叙述》，《社会记忆：历史·回忆·传承》，哈拉尔德·韦尔策编，季斌等译，第21—22页，第23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

[5][9][33] 张光年：《向阳日记·引言：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》，第1页，第6页，第5—6页，上海远东出版

社1997年版。李季47岁，严文井54岁，葛洛59岁。

[6] 陈白尘1908年生人，时年61岁。杨绛1911年生人，时年58岁。

[7] 陈白尘1969年11月25日、26日和27日的《牛棚日记》，记述了专案组谈话，作为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”下放干校的情况。他和张光年属北京和干校双管人员，最初寄信南京家里被阻，只好冒险偷寄（参见该年12月2日日记）。当年，冰心69岁，张天翼63岁，郭小川50岁。

[8] 1936年考入上海山海工学团学艺师范班后，许翰如在洗星海指挥大家唱《五月的鲜花》时，第一次听说了光未然的名字。1938年光未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（厅长是郭沫若），任三厅中共地下特支宣传干事时，曾对“我们孩子剧团的小朋友十分关心，问寒问暖”，这是他在干校比较关照这位老领导的原因之一。参见许翰如《在星海工学团唱响〈五月的鲜花〉》，《回忆张光年》，中国作家协会编，第231—233页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。

[10] 咸宁当地农民60岁后不再下田劳作，下雨休工在家。所以农民说下放干部是：“大雨大干，小雨小干，晴天不干！”出自陈白尘《忆云梦泽》，《向阳湖纪事——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忆录》上，李城外编，第20页，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11] 萧乾：《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》，《湖北文史资料》1999年第2辑。

[12][31] 牛汉：《五年零三个月的干校生涯》，《向阳湖纪事——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忆录》上，李城外编，第258页，第264—265页，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13] 韦君宜：《干校劳动的回忆》，《湖北文史资料》1999年第2辑。韦君宜52岁，舒芜47岁。

[14] 据谢永旺说：“张光年特别敏感，在政治上是有经验的。”唐达成认为，张光年有高超的组织领导艺术，“善于平衡各种力量，善于掌握各人心理，又能恰到好处地予以解决处理。”参见陈为人《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》，第84、169页，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。

[15][19] 臧克家：《咸宁干校散记》，《向阳湖纪事——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忆录》上，李城外编，第11、13页，第13页，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16] 陈白尘：《忆云梦泽》，《向阳湖纪事——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忆录》上，李城外编，第20—21页，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17] 陈早春：《冯雪峰与我放鸭子》，《湖北文史资料》1999



年第2辑。

[18] 张光年是“周扬案”36人之一，由康生和江青主管。

1974年底咸宁干校解散后，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安排工作，而是转往天津静海五七干校，说明他“问题”的性质，比臧克家等一般黑帮严重。

[21] 马克·弗里曼：《传统与对自我和文化的回忆》，《社会记忆：历史·回忆·传承》，哈拉尔德·韦尔策编，季斌等译，第4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

[22] 阎纲：《怨也向阳，念也向阳》，《向阳湖纪事——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忆录》上，李城外编，第461页，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23] 顾学颉：《向阳湖点滴》，《向阳情结（上）：文化名人与咸宁》，李城外编，第140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。顾学颉（1913—1999），字肇仓，号卡坎，古典文学家。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，曾任西北联大、国民大学教授和系主任，解放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高级编辑。1957年错划右派。1969至1973年在咸宁干校。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。编选、校注的著作有《元人杂剧选》和《白居易集》（四册）等。

[24] 周汝昌：《干校惊雷》，《向阳湖纪事——咸宁“五七”

干校回忆录》上，李城外编，第38—41页，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25] 李昌荣：《干校三记》，《向阳湖纪事——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忆录》下，李城外编，第167页，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。李昌荣，女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图书资料室主任。

[26] 宗璞：《握手》，《回忆张光年》，中国作家协会编，第193页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。

[27] 绿原：《我们夫妻的“超蜜月”》，《向阳湖纪事——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忆录》上，李城外编，第268—270页，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28] 郝孚逸：《实话实说话“干校”》，《湖北文史资料》1999年第2辑。

[29] 杨子敏：《苦乐甘辛话“向阳”》，《向阳湖纪事——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忆录》上，李城外编，第237页，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30][32] 陈白尘：《牛棚日记》，第172页，第227—229页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。

[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]

责任编辑：罗雅琳

## 投稿须知

为进一步规范审稿流程，完善匿名审稿制度，本刊决定在实行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的基础上，全面推进全流程双向匿名审稿。请您在网络平台投稿时删除附件（原稿件）中与作者相关的所有信息，否则，投稿无效。

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

2020年11月15日